

## 万隆精神下的新中国对阿外交 与新时代的中阿关系

余建华

**摘要：**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知相交，中阿友好合作源远流长。作为战后国际关系史重要里程碑的万隆会议，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直接接触，为中埃关系实现突破性进展并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第一波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万隆精神下的中阿友好合作不断走向深入。近十年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高度。2020年，中阿双方在抗疫合作中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谱写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成为双方在新时代对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的践行。

**关键词：**中阿关系；万隆精神；中阿命运共同体；抗疫合作

**作者简介：**余建华，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文章编号：**1673-5161(2021)02-0003-14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使得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知相交,中阿友好合作源远流长、历久弥新。1955 年 4 月召开的万隆会议成为新中国开拓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里程碑,为中埃关系实现突破性进展、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第一波建交高潮创造了契机。在万隆精神的引领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团结互助、友好合作,双方友谊不断发展与深化。近十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各国肩负民族复兴、经济发展的共同使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共谋繁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阿战略合作提档升级。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阿双方心连心、同命运、共呼吸,守望相助,合作抗疫,共同应对新的挑战。这既是新时代中阿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又是新时代双方对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的践行。

## 一、从丝绸之路到万隆会议

位于东亚的中国与地处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世界虽然相距千山万水,但早在邈远古代,丝绸之路便架起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之间的友谊桥梁。对同样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东方古国中国与埃及来说,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和尼罗河畔的埃及人民相互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公元前 4 世纪,亚历山大帝国促成古代东方与地中海世界通道西半段的畅通,随后东方汉帝国的昌盛则有助于这一通道东半段的开通。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命张骞“凿空西域”<sup>①</sup>,由此开启了中国内地与西域、印度、中亚和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的直接交往,进而完成了贯穿亚欧大陆东西方最为重要的交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的开辟。多位中外著名学者认为,在张骞回国后给汉武帝的报告中,所提到的西行抵达的黎轩即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 305 年~前 30 年)首都的亚历山大里亚。<sup>②</sup>《史记·大宛列传》留下前 120 年汉武帝遣使至黎轩的记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来华“黎轩善眩人”就是亚历山大里亚魔术师。<sup>③</sup> 中国遣使埃及和埃及魔术师抵华,标志着中埃之间交往通道的打通。公元

---

① 关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公元前 138 年和前 119 年汉武帝派遣侍从官张骞两度出使西域的记载,详见《史记·大宛列传》。

② 《黎轩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载[法]伯希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34-35 页;[英]戴闻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胡国强、覃锦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5 页;Teohaldo Filasi,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Frank Cass, 1972, p. 94;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6 页。

③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8 页。

1 世纪,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在宴会上身穿华丽的中国绸衣。<sup>①</sup> 此后近 2,000 年间,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串联起中国与西亚北非阿拉伯地区的经济文化互通往来。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地区更是进入全面交往的时期,不仅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言“求知,哪怕远在中国”,更有《旧唐书·大食传》对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大食<sup>②</sup>正式遣使来华的明确记载。此后 148 年间,大食国遣使中国见于中国史籍记载达 40 次。<sup>③</sup> 中阿民族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经贸往来更是络绎不绝。阿拉伯商人来华采购蚕丝、丝织品、瓷器、茶叶、铜铁器皿等,同时带来象牙、犀角、乳香、宝石、珊瑚、琉璃、丁香等,中国的丝织、瓷器制造技术和造纸术、指南针、火药三大发明也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唐代出现了中国首部以汉文记述中东阿拉伯世界的珍贵文献——在大食国居留 12 年的杜环所著的《经行记》,也有阿拉伯商人详尽记载中国的阿拉伯文献《苏莱曼东游记》。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商贸人文关系日益密切,互利交往热潮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

近代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均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中阿双方均困于外患的情况下,相互间的交往自然受到相当程度的干扰与损害。但即便处于逆境时期,中阿双方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也未中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处西方殖民帝国列强压迫悲惨境遇的中阿人民患难与共、同仇敌忾,他们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中遥相呼应、相互支持。一战后,中国报刊《东方杂志》热情赞颂埃及的反英独立运动,称赞 1922 年埃及独立是埃及人民多年奋斗的结果。孙中山、扎格鲁勒夫人等中埃两国的政治家均指出两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共同展开反帝斗争。<sup>④</sup> 同在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斗争的中国人民也对 1921 年至 1925 年摩洛哥里夫军民反殖民族解放运动表现出由衷而深切的同情与声援。

显而易见,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中阿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中阿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休戚与共,为 1955 年万隆会议前后中阿政治家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握手和 1956 年新中国与埃及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包括 9 个阿拉伯独立国家在内的亚非 29 国<sup>⑤</sup>代表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首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

① Wilfred H. Schoff,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 Sea: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Navigation of the Ancients*, New York: Longmans, 1912, p. 265.

② 大食是唐朝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

③ 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北非的海上往来》,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9 页;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 页。

④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第 190-191 页。

⑤ 除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 5 个发起国外,出席万隆会议的还包括中国等 18 个亚洲国家和埃及等 6 个非洲国家。

意义的重要里程碑。

首先,万隆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史无前例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盛会。它不仅是当时覆盖区域最大、人口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洲际会议。与会亚非 29 国占全球独立国家的 1/2,面积占全球的近 1/4,人口占全球的 2/3,是亚非国家首次在没有殖民列强参与下独立自主处理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规模国际会议。万隆会议的圆满召开,表明亚非人民已经或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压迫和主宰,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参与国际事务决策,开展国际联合斗争与相互合作。万隆会议冲击了雅尔塔两极体制,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成为战后两极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的重要转折点。

其次,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以“求同存异”精神排除矛盾与障碍,实现团结合作。与会代表们不仅在民族、种族、肤色、语言、文化上各不相同,这 29 个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差异也较大。加之历史遗留问题,相互间难免存在不少隔阂与矛盾,对于国际问题的见解亦存在不少分歧。对此,某些国际势力深感忧虑,它们不仅在会前会间、会内会外上蹿下跳,而且极尽阻挠和诽谤之能事,几度使会议进展面临危机。中国代表团以“求同存异”的方针,使与会各方找到了消融隔阂、增强团结的共同基础。与会各方最终以协商一致的原则,就共同利害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最后,万隆会议凝聚亚非国家共识,弘扬和平共处原则,倡导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集中反映了亚非新兴国家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共识。公报最后部分是在中国提案基础上获得全体会议代表一致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它明确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包括尊重基本人权、《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平等、大小国家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等。<sup>①</sup> 这些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被广泛接受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显然是会前中国与印度、缅甸达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发展。它不仅是亚非国家冲破雅尔塔两极体制和冷战束缚、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石,也是倡导世界各国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应当普遍遵循的国际关系准则。

加强团结合作、反对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解放、发展民族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共同愿望,也是万隆会议的根本宗旨。从会议成果来看,万隆会议无疑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

---

<sup>①</sup>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1955年4月2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99-105页。

## 二、万隆精神与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开启

万隆会议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崛起的重要标志,它冲击了战后世界两极格局。当代世界史专家巴勒克拉夫等人在事后不久断言:“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个时期内发生的一切事件也许都不比万隆会议具有更持久的重要意义。……由于增加了一支‘第三势力’,万隆会议重新铸造了国际事务的结构,并将老问题置于新的历史环境之中。”<sup>①</sup>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万隆会议无疑体现出亚非国家和人民为反帝反殖、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精神——万隆精神,它以珍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载入人类史册,对此后国际关系发挥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对新中国对外关系而言,万隆会议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打开国际局面、开拓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亚非外交的伟大成就。万隆会议是战后新兴亚非独立各国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精神结晶。万隆会议的成就来之不易,一方面,它是印尼等会议发起国和包括多个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与会各国集体协作的成果;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英明决策、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关键的杰出贡献。

新中国对万隆会议的高度重视与全力支持,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国家身份定位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关于国际环境“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密切相关。新中国在成立初期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和险恶的战争威胁,特别是美国等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国际孤立与封锁,因此维护国家主权、打开国际局面成为新中国外交一项迫切的主要任务。同时,中国领导人出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判断,确立了新中国作为一个曾遭受殖民侵略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身份定位,同情和支持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理所当然,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自然对团结广大亚非独立国家以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格外重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经历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外交调整、美国军事遏制恶化国际安全形势以及朝鲜停战和日内瓦会议等一系列国际形势重要变化。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认为,除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同美国斗争的“一边倒”之外,中国外交还需要探寻新的发展空间,而处于美苏

---

<sup>①</sup> 俞正梁等:《战后国际关系史纲:1945~198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之间“中间地带”<sup>①</sup>的亚非地区是可以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重要战略空间。这一地区不仅是中国在美苏两个阵营之外展开战略竞争的新舞台,更是中国打开国际局面、提升国际影响力、构筑比中苏同盟更为持久可靠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中国可能在这里发挥足够强大的引领影响。<sup>②</sup>由此,中国对万隆会议的主要目标便是在争取突破国际不利局面的同时,全力支持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亚非国家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中国虽非万隆会议发起国,但中国从会议最初的酝酿阶段开始就积极响应和给予大力支持,并为之紧锣密鼓地展开周密且细致的准备。中国代表团赴会之前,中共中央认真制定了具体的与会方案,得到 1955 年 4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确定与会总方针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sup>③</sup>临行前,中央授权周恩来总理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不负众望,挫败了包括“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在内的敌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阴谋,在会议期间开展了原则性与务实性相统一的、富有成效的灵活外交,发表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演说。以共同的历史遭遇和时代使命确立了亚非各国团结合作的共同基础,解开了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议,推动了会议在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基础上达成包括万隆十项原则在内的最后协议。这次“峰会外交”的成功,消除了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偏见、疑虑和误解,是新中国推动亚非外交极其重要且关键的一步,随后掀起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建交的高潮。万隆会议之前,与新中国建交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仅有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五国,西亚非洲没有一个建交国。而从万隆会议后至 1959 年短短四年间,尼泊尔、埃及等 10 个亚非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

值得一提的是,万隆会议也是新中国打开对阿拉伯国家外交局面的历史里程碑。参加万隆会议的亚非 29 个国家中,有超出 1/3 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其中包含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约旦、黎巴嫩、利比亚、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共 9 个阿拉伯国家。另外,当时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北非 3 个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组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突尼斯新宪政党、摩洛哥独立党也应

---

① 二战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他在 1946 年 8 月 6 日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95 页。

② 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 年)》,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63-66 页。

③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1955 年 4 月 5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第 42 页。

邀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不过,当时新中国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在西亚和非洲尚未打开外交局面。与会的阿拉伯国家多数是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少数为西方式的共和制国家,在政治、文化和外交上深受英、法、美影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多有隔阂、误解,持以敌视、冷漠立场,均未承认新中国。其中,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还与台湾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极其重视万隆会议,也十分珍惜这一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和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直接接触的“峰会外交”。中方不仅派出以周恩来、陈毅为正副团长的高规格代表团,还特地邀请懂阿拉伯语、德高望重的著名伊斯兰教阿訇、时年82岁的达浦生作为代表团顾问。正是从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开拓亚非外交这一与会总方针出发,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内外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积极主动、热情真诚地与参会的埃及、也门、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各国领导与人士交流往来,介绍中国的情况,阐明中国立场和政策,交换对中东地区和国际问题的见解。由此,新中国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开始了国家间的正式接触,增进了相互了解,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外交的起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万隆会议为中埃关系突破性的进展创造了契机。埃及总统纳赛尔是参会阿拉伯国家中级别最高的领导人,又是当时威望日益上升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周恩来总理赴万隆前已在仰光会晤了纳赛尔,在万隆会议期间又多次与纳赛尔举行会谈。不仅如此,周总理还设宴招待埃及代表团,出席纳赛尔举行的宴会。两位历史伟人一见如故,倾心相交。他们一起参加了万隆会议政治委员会与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共同推动会议通过了包含“万隆十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双方就各自国家的情况、对外政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纳赛尔澄清了一些受西方媒体恶意诬蔑而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和疑虑。当纳赛尔谈及帝国主义控制棉花市场而使埃及蒙受巨大损失时,周恩来总理承诺中国将进口埃及棉花。纳赛尔坦言,埃及准备承认新中国,但迫于美国因素希望中国能够谅解当时埃及同台湾断交的困难。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表示理解,表示愿意先发展两国经贸和文化关系。中埃代表团就双方经济文化合作举行了会谈。纳赛尔既被周总理的睿智卓识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也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有了全新的了解与认识。他与周总理达成共识,同意两国关系从贸易着手,到互派商务机构,再到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正如纳赛尔所强调的,万隆会议将埃及与新中国团结起来,确定了共同目标,为加强埃中关系奠定了基础。<sup>①</sup>

<sup>①</sup> 肖宪:《当代中国—中东关系》,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

万隆会议期间,阿拉伯各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强调及其一致立场,引起了中方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两位著名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袖艾哈迈德·舒凯里(后出任巴解首任主席)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并对巴勒斯坦人合理正当的民族权利主张予以同情和支持。正是从万隆会议开始,中国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影响。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明确支持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亚非各国反帝反殖正义斗争,这同当时中国国际斗争的目标相一致。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支持中东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捍卫国家独立斗争的坚定立场,包括支持埃及人民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斗争,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正当权利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还与叙利亚代表团进行了接触,积极支持叙利亚所持的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的立场。

当时,与会的众多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大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教政策缺乏了解,并存在一定误解。部分国家代表甚至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指使,将会议议题引向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会议的和谐气氛和正常进程。为此,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将大会主要发言书面稿散发后,又做了针对性明确的补充发言。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阐发“求同存异”的中国理念,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sup>①</sup>周总理发表了18分钟即席精彩演讲,立竿见影地改善了会议气氛该演讲受到包括纳赛尔在内的与会各方代表的高度赞赏,被誉为“在亚非会议上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伟大作用”。<sup>②</sup>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以诚挚友好的态度广交朋友,摆事实、讲道理,赢得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尊重与好感。针对阿拉伯国家对中宗教政策的疑虑,周恩来总理特别指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周总理亲自与沙特首相沟通磋商,获得了沙特对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入境的同意。1955年7月,达浦生阿訇率领新中国第一个穆斯林代表团前往沙特麦加朝觐。不久,中国经贸文化代表团也应邀访问阿拉伯国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同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签订了十余项经贸文化合作协议。万隆会议是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分水岭。

---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157页。

② 朱威烈:《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第6页。



万隆会议前,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几无往来;万隆会议后,新中国开始了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交往。<sup>①</sup>

中国正是通过以“求反帝、反殖之同,存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之异”这一“求同存异”的原则,来结成最广泛国际统一战线。换言之,正是在这种围绕亚非国家反帝反殖、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目标之下,倡导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万隆精神,成功打开了对阿拉伯地区的外交局面。

埃及是首个与新中国建立的阿拉伯国家。万隆会议后,中埃文化与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中国坚定支持埃及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立场。中国不仅协助埃及购买武器,而且兑现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的承诺,以高价购买了大量埃及棉花,为埃及雪中送炭。中埃两国关系正常化“水到渠成”。1956年5月16日,埃及政府决定撤销对台湾当局的承认,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翌日,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声明,对埃及立场表示热烈欢迎。5月30日,中国和埃及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考虑到两国的相互愿望,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sup>②</sup>。中埃建交瓜熟蒂落。

埃及是当时阿拉伯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也是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中埃建交标志着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开启了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1956年7月,叙利亚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8月,中叙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互派大使;9月,中国与也门建交。1958年8月,中国与伊拉克建交。1959年,中国又相继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3个阿拉伯国家建交。1960年至1965年间,索马里、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又成为中国建交国。这波建交高潮与新中国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和正义事业相伴相随。以阿尔及利亚为例,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定支持该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以各种方式慷慨无私地援助阿国,是全球第一个宣布承认阿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非常感谢中国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正是这种反帝反殖斗争中“患难之交”的珍贵情谊,促使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连续多次与阿尔巴尼亚发起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两阿提案”。1971年9月25日,该提案在联大表决中终获成功。埃及、叙利亚等13个阿拉伯国家投了赞成票。这些国家能够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对中国的核心利益给予有力支持,无疑彰显了为国际正义事业而求同存异、共同团结、相互合作的万隆精神。

<sup>①</sup> 肖宪:《当代中国—中东关系》,第54—55页。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四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 三、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合作：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

万隆会议距今已 66 年。半个多世纪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两极冷战对峙已成历史,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历沧桑巨变,走上了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国家道路。至 1990 年,中国已同 22 个阿拉伯国家全部建交。坚实的友好基础、相互间的战略需求和共同的战略利益,促使 21 世纪初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合作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在 2004 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开罗阿盟总部期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宣布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阿合作论坛”)。双方宣布以丰富中阿关系内涵以及拓展和巩固中阿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合作为目标,建立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sup>①</sup> 2010 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宣布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中阿集体合作进入全面提质升级的新阶段。

近十年来,阿拉伯地区多个国家遭遇社会动荡的政治大变局。但中东变局并未阻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彼此重视、合作共赢、相向而行的发展趋势。阿拉伯国家总体上对中国建设性地介入中东事务持积极的态度,甚至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中东变局凸显出阿拉伯国家社会治理和发展模式的深重危机,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导致的民生危机,使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由此强化了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倾向。中国伴随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中国对外投资的能力和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都受到阿拉伯国家的高度重视。阿拉伯国家深化与中国战略合作、实现本国发展战略与中国发展战略对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奋斗目标。同时,中国政府也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思想。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

---

<sup>①</sup>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2004 年 9 月 14 日,开罗),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非司编:《“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文件汇编(2004-2010)》,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页。

国好,世界才更好。”<sup>①</sup>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社会相通。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国不仅追求与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致力于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更要从“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身份出发,坚定不移地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地区作为战略依托,巩固传统友谊,弘扬正确义利观。

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从世界与中国发展大势出发,为促进沿线各国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重大战略倡议。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一带一路”构想。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sup>②</sup>习主席在会上发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1955年,中国和印尼两国同其他亚非国家携手合作,在万隆会议上共同倡导了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万隆精神至今仍是国与国相处的重要准则,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并倡议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sup>③</sup>

中国和广大阿拉伯国家都肩负着改善民生、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需要弘扬丝路精神和万隆精神,为深化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增添动力与活力。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阿拉伯世界曾作为重要的地理枢纽与贸易中心,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今,对于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建设而言,位于“一带一路”交汇地带的阿拉伯国家同样不能缺席。在2014年6月5日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明确强调“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为丝绸之路相知相交,我们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习主席指出,中阿双方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既要登高望远、也要脚踏实地,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

<sup>①</sup>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12页,第422页。

<sup>②</sup> 同上,第42-46页。

<sup>③</sup>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2013年10月3日,雅加达),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

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sup>①</sup> 与会阿方代表积极呼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赞同习主席提出的加强论坛建设、发展阿中战略合作关系的主张。2016 年 1 月 21 日,习主席在访问阿盟总部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针对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四大行动计划,强调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提出要致力于劝和促谈,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此前不久,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详细阐述了中方全面加强中阿关系的各方面的政策举措。<sup>②</sup> 这是中国政府制订的首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文件。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时代,中阿战略合作已上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高度。2018 年 7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宣布,经过中阿双方友好协商,中阿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sup>③</sup> 与 2010 年提出的“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相比较,这次中阿关系定位增加了“面向未来”的表述,同时强调了“战略伙伴关系”。虽是几个字的变化,却意义非凡,表明双方更加着眼于中阿合作的长远利益,显示出中阿合作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高度,成为新时代中阿友好合作新的历史起点。习主席这次讲话着眼于中阿双方的长远利益,阐述了中阿合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主张。他指出:“中阿双方优势互补、利益交汇,我们要把彼此的发展战略对接起来,让两大民族复兴之梦紧密相连。”为此,双方要牢牢抓住互联互通这个“龙头”,积极推动油气合作、低碳能源合作“双轮”转动,努力实现金融合作、高新技术合作“两翼”齐飞。习主席提出,中阿要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增进战略互信、实现复兴梦想、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包容互鉴,共同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正如时任阿拉伯驻华使团团团长、阿曼驻华大使阿卜杜拉·萨阿迪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中阿合作发展制订了计划,成为“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开展密切合作的路线图”<sup>④</sup>。

2020 年春季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得阿拉伯多国社会经济遭遇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118-125 页。

② 《中国政府发布首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人民网,2016 年 1 月 14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114/c1002-28052011.html>, 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30 日。

③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8 年 7 月 10 日,北京),载《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11 日,第 2 版。

④ 白洁、潘洁、朱超:《为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解读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 年 7 月 1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7/11/c\\_1123106936.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7/11/c_1123106936.htm), 上网时间:2021 年 1 月 30 日。

重创。不仅各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突遭中断,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被按下暂停键或遭受重创,商业、旅游业一片萧条,国家财税收入剧减,失业率骤增,民生医疗负担陡升。随着航空、海上航运以及城际铁路、公路的停顿或压缩,全球石油需求大幅下降,这导致原油价格急剧下跌甚至出现负油价。阿拉伯多国油气出口收入锐减,金融市场也因石油价格的历史性下跌而受到严重冲击。

在这场突如其来且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面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领导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两个百年”目标的继往开来,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与为世界人民做贡献的双重使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重视及时推动与有效开展抗疫防疫国际合作。面对疫情来袭,中国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始终与世卫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同有关国家分享防疫经验,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同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抗疫合作。2020年1月22日到4月12日,习近平主席同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29个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话36余次,向埃及等10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区域组织负责人致慰问电。<sup>①</sup>不仅如此,习主席还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对推动全球携手、并肩抗疫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可谓患难见真情。中国在真诚感谢阿拉伯国家给予中国抗疫宝贵支持的同时,也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以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合作姿态,及时向阿拉伯多国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协助在华采购防疫物资,派遣医疗专家组赴阿拉伯国家,举办视频会议分享防控诊疗经验,积极推进抗疫合作。中国向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突尼斯、叙利亚、沙特、埃及等国家捐赠医疗物资,在伊拉克援建新冠病毒检测中心,为援建埃及口罩生产线提供设备、技术、资金以及部分原料。2020年3月26日,中国同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科威特、卡塔尔等16个国家的卫生官员和专家举行新冠疫情卫生专家视频会议。4月9日,中国与阿盟秘书处以及阿尔及利亚、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巴林、也门、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等12个阿拉伯国家举行卫生专家视频会议。6月22日,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以“携手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召开,阿拉伯国家60余位主要政党

<sup>①</sup> 《中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纪事》,新华网,2020年4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4/06/c\\_1125819214.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4/06/c_1125819214.htm),上网时间:2021年1月30日。

领导人参加。习近平主席在向会议致贺信中指出,疫情再次表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包括广大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为国际抗疫合作提供力所能及支持和帮助,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习主席强调,中阿政党对话会是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政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面对疫情带来的新形势、新挑战,双方要发挥好中阿政党对话会的平台作用,继续加强战略沟通,深化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构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实现中阿两大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sup>①</sup> 7月6日,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中阿双方发表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联合声明》,重申加强团结、促进合作、相互支持,携手抗击疫情,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推进中阿战略合作不断深化与升华。

疫情无国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团结协作、同舟共济、携手应对。66年前,以埃及总统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与会国为万隆会议的圆满成功发挥了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在万隆会议上,中国和埃及等亚非国家为反帝反殖、民族独立、世界和平而求同存异,为中国开拓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亚非外交奠定了基础。随后,中阿友谊与合作在万隆精神指引下不断深化拓展。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又从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弘扬丝路精神和万隆精神,为深化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增添动力与活力。如今,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严峻挑战,中阿双方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守望相助。这既是中阿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又是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的当代弘扬。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经过此次疫情考验,中阿传统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升华,中阿战略合作必将迈上新的台阶。毫无疑问,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安危与共、守望相助,真诚团结与合作,共同谱写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辉煌篇章。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包澄章)

---

<sup>①</sup> 《习近平向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致贺信》,人民网,2020年6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623/c64094-31756023.html>,上网时间:2021年1月30日。